

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

河南人民出版社



第二輯

责任编辑 陆树庆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

第二辑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编辑委员会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7 $\frac{1}{2}$ 印张 340千字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统一书号 11105·27 定价 1.41元

改 版 说 明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一辑，原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因为印刷上存在许多困难不好克服，所以决定自第二辑起改版，并移交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改版过程中，承蒙河南人民出版社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谨致谢忱。

当前，我国历史学界，在农民战争史领域里，学术空气日趋活跃，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正在形成。如何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这是摆在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农民战争一般理论问题的探讨，必须建筑在对于大量历史事实的分析基础上，必须从实际出发。唯其如此，才能正确地揭示出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客观规律。

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发生了大小千百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对于这许多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迄今为止，还不能说已经研究得差不多了，恰恰相反，已有的研究成果，还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就农民战争史的一般理论问题的讨论而言，过去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陷于概念之争，在争论过程中，往往又不大遵守同一律，或者转移命题，或者抽换概念，以至各持一端，争来争去，进展不大。而就对历代农民战争的研究来说，过去的注意力，大部集中对于历代封建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上，而对于历代封建王朝前期和中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则很少有人注意，有些虽被注意到了，但研究的也很不充分，以致还有许多空白点。这样一个状况，要对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作出结论，要在农民战争史的一般理论问题的争论上取得一致的意见，显然是匆忙的、不可能的。因此，有必要花一定的气力发掘新史料，对那些研究不够充分、或者根本没有研究过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进行认真地探讨。

改版后的《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本着这一意图，在第二辑里用适当的篇幅刊载了这方面的文章，试图作一些“填空”的工作，以期推进农民战争史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

然而，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在编选过程中，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〇年二月于北京

DA72/07

目 录

- 农民运动与宗教陈守实遗稿 (1)
- 关于农民战争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田昌五 (11)
- 论“四权”与明末农民战争的关系王春瑜 (48)
- 乡党邻里、宗族姻亲关系在农民起义军
中的组织作用刘伯涵 (67)
- 西汉武帝时期的流民问题和农民起义田人隆 (81)
- 《太平清领书》和太平道孙达人 (112)
- 汉末张鲁问题史实考辨高 敏 (138)
- 论葛荣朱大渭 刘精诚 (168)
- 唐代西原人民起义初探李斌城 (188)
- 方腊起义失败原因辨析邱鸣皋 (204)
- 关于范汝为起义的几个问题白 钢 (231)
- 南宋广西李接起义朱瑞熙 (272)
- 元代前期和中期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陈高华 (286)
- 论罗汝才顾 诚 (321)
- 论张献忠在明末农民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唐宇元 (337)

- 关于捻子的几个问题 许曾重 (367)
论石达开 苏双碧 (418)
关于太平天国建都南京的几个问题
..... 薛瑞录 林金树 (449)

【读史札记】

- 王伯当 黄惠贤 (494)
杨四娘子的结局 温 岭 (503)

【国外研究动态】

- 太平天国与秘密会社及其他造反者的关系
..... C·A·柯温 杨品泉译 (507)
关于清末哥老会的几点看法
..... 查尔顿·M·刘易斯 一山译 (527)

农民运动与宗教

陈守实遗稿

农民运动与宗教问题，不但经典作家早有结论，就是中国的旧史家也已有粗朴的结论。目前史学界论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者，在对理论的理解和史料的诠释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援用具体的史实，作深入的理论分析，还是很有必要的。

巫术，原始宗教，神权，神话迷信，以及一切神秘主义，尽管它在历史生活中发生过各种作用。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幼稚病。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产生宗教的土壤已经基本消灭。我们完全可以放开科学的视野，回顾历史，对农民运动与宗教作出清澈的透视。

恩格斯曾经指出：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暴动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归是穿着宗教的外衣出现，……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着非常明显的现世的利益。”^①根据这个论点，对群众运动，即用农民运动这

^①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史》，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二二——二三页。

一命题来包括农民起义、农民暴动、农民战争，进行深入的研究，必然能透露现世的阶级利益，逐步剔除混乱。

批判是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不管是史料辑录，还是理论阐释。农民运动由混乱到明确；神秘外衣清除后现实利益的透露；革命农民血与火的批判的实践；凡此，都是我们考察农民运动与宗教的前提。非批判的宗教史是不可想象的。农民运动是历史动力，农民运动史上所沾染的宗教迷信，以及一切神秘主义的气氛，必须首先在历史事实上分解洗涤，历史才会发出更多的光亮。

有人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①。是太简单了，或者说不适用于历史上的神权与宗教。这里，历史事件的解剖是重要的。宗教事实的罗列，宗教历史的叙述，只能作为马克思主义显微镜下的材料才是有用的。离开这点，颇易导致糊涂一团，成为宗教神权的俘虏。

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史时，曾把社会主义和原始基督教作过平行的比较。他说：“在原始基督教的历史里，有些与现代工人运动的值得注意的相合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其产生时也是一种受压迫者的运动；它开始时是作为奴隶和解放的农奴，穷人和无权利人，被罗马人征服或被他们驱散的人们的宗教而出现的。基督教和工人社会主义都宣传将

①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来要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来生，在死后，在天上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却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来寻求这种解脱”^①。非常清楚，宗教与革命产生于同一个社会根源，即社会的贫困和落后，但是走着两条背道而驰的路，宗教是用诅咒、祈祷把希望寄托于来世，而革命是经过斗争反抗，把解除一切痛苦的希望，寄托在现实世界的根本改造。农民运动与宗教的不同之处是在于，农民运动把对现实的不满，诉诸斗争，在群众性的斗争实践中，不但逐渐认识了现实，而且能够改造现实，至少也能使现实发生变化。

私有制出现，阶级社会存在，宗教加上这一复杂的社会关系，更加成了麻醉剂。它把现实的痛苦虚幻地付诸未来、彼岸、天国中去解决，而不在现实中展开斗争，这是有利于统治者和剥削者的。但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落后，科学不发达，被社会力量所支配的劳动群众，对现实的苦难，用宗教式的诅咒，来否定现实；由于统治者的利用宗教，自身却也陷入于宗教的迷惘中，所以农民运动，同样可以利用宗教作为震动现实的爆炸工具。这在封建专制王朝的历史进程中，是可以找到各种史实来作例证的。

《汉书》列传四十三韦贤传附子玄成传：

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尊高帝

^① 恩格斯：《论原始基督教史》，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二一页。

庙为太祖庙，景帝尊教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一百四十七人，……（汉元帝）永光四年，乃下诏先议罢郡国庙，……往者天下初定，远方未宾，因尝所亲以立宗庙，盖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也。（颜师古注：销遏逆乱，使不得萌生。）

汉在郡国京师，所立皇帝庙多至百七十六所。用人几近十万。目的是：汉元帝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建威销萌的一种方式。所谓“一民之至权”就是一种策略；想尽方法使封建皇帝神圣化，配合当时世家大族的宗党组织，建立宗法式统治的权威。以宗法神树立各地区神秘的权威代替旧封侯。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定儒术于一尊，大体上中央集权专制形式已完备，所以汉元帝时就无需再在郡国立庙，增此麻烦，“罢郡国庙”，就有普遍要求。同时地方性的神祀，也在汉代开始。

以较近代的史实为例：

丞相（李）善长，学士（陶）安，太常卿（胡）惟庸等奏：国有大祀，曰园丘，（天）曰方丘，（地）曰宗庙，曰社稷。……祝（太祝官）称孝子皇帝，不称臣。遣皇太子，祝称遣长子某……（《明史·郊祀志》）

这是封建皇朝用家族宗法建立宇宙一元的自然系统，以麻醉人民思想意识的典型表现。从《史记》的天官封禅，刘向、刘歆父子的五行大义，班固《汉书》五行传，以及各个断代史的符瑞灾异，无一不是将自然人格化的反映；它与自然经济下宗法式的生产组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伦理式的政治系统、乃至“井地乎，无异财”的一整套家族共同体的设想，最后都在道家式的极端自然主义理想化上找到共同点，互相紧密配合。

但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神道设教，不但自身也受到麻醉的影响，人民群众也会利用宗教运动的形式，去反对统治者。一八五三年，马克思在论《普鲁士的宗教运动》一文中指出：

一个一方面以它对一切宗教传统抱彻底、大胆和无比的批判精神而著名的国家，另一方面又不时重新爆发十七世纪的宗教纠纷而使整个欧洲吃惊，这样的国家是怎么回事呢？这里的秘密不过是，政府使任何一个刚刚产生但暂时还在暗中活动的人民反对派起初都不得不采取一种神秘的、几乎不受任何监督的宗教运动形式。而僧侣们也甘用这种幌子来欺骗自己，他们还以为自己利用人民的热情去反对政府只对自己的团体有利，然而实际上却是事与愿违，不自觉地起着革命工具的作用^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五七四页。

按中世纪宗法式的生产组织，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生活非常孤立，人民反对派本来不容易产生，也不允许产生，只能采取宗教运动形式来集结群众，打破宗法式组织，在运动中逐渐变成反对派。因此，宗教运动往往成为反对派的特种形式。在运动中宗教有时也成为爆破旧秩序决口的革命代用品。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在汉代末年适用的爆破性用语（如把这类用语当作口号是不适当的，因为口号是政治用语，而不是宗教迷信的用语）。一方面被封建统治者神圣化的封建政权，和封建政权有关的一切伴随物，例如五行符瑞，自然势力的人格化等等，作为精神压迫的工具；另一方面被统治被压迫的被剥削者，也利用宗教迷信作为集结群众的工具，用诅咒性的神秘的预测来冲破现实的决口。这两者在历史的进程上是有一定的尺度的。生产力低下，依附关系比较浓厚的时期，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出现。这在历史上是可以随处找到佐证的。

《汉书》卷七十五传赞：

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此其纳说时君著明者也。

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来建立神秘的宗法体制，如《汉书》韦贤传所载京师及各地建立的刘姓皇帝庙以“建威销萌”外，还更广泛地利用“神道设教”来多方面麻醉人民，使他们驯服在封建统治的一整套机体下。但另一方面，从东

汉光武刘秀时期开始，一直到黄巾的发难，妖贼、太平道、五斗米道、天师道，集结被压迫群众冲击现实，反对封建统治者的运动，此起彼伏，从未停止。

自然经济的生活形态是分散孤立，而俗语、俗谚、闻巷常谚（请参阅钱竹汀：《潜研堂集·恒言录》），都是群众性的斗争经验的总结。当然，在封建社会中，生产力低下，封建关系浓重，这种童谣民歌，必然会加上许多宗教神权的烟雾，把群众性的诅咒当作预言，当作现实的爆炸品。“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叶子奇：《草木子》）元末红巾军曾用此发难。这不一定是韩山童、刘福通等的设计，也不仅仅是贾鲁治河得罪了沿河丁夫，而是社会对抗已达到极度尖锐化时期的必然产物。淹没在宗教的迷魂阵里的一些史家，把红巾军归属于白莲教系统，而白莲教又和弥勒、大乘、明教、摩尼教牵混，在教义上增加了许多附会曲说，以证成其所谓革命的宗教之说，在血与火的历史事实上硬加上许多毫不相干的宗教服装，而忘记了农民运动本身最本质的东西。

农民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有旧的、古老的和新的、科学的两种。

第一种是原始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残余在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生活中的理想或幻想的图案。在这样的图案中往往渗透一些神道迷信的气氛。第二种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知识的产物。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或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无阶级的原始公社制度的高级形式的重复。一八五〇年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合著的《国际述评（一）》一文中所涉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①，要求消灭私有制，这是原始共产主义的残余，是农民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农民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在农民运动发展史上，是经常发生的现象，存在于各种秘密会社；如果以为这种社会主义气息，只属于天地会，不属于上帝会，或者说这是指上帝会而不是指天地会，显然是不学无术的臆揣。

科学的社会主义，曾科学地分析过原始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认为这是一种财富的平均分配，和消费标准化（亦即平均主义的分配）的共产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主张财富集中、生产集中不同。原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建筑在生产力极低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的，即原始共产主义制度在私有制阶级社会的一种残余的回复，与高度发展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原则的差别。

《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

东汉末年黄巾、太平道、天师道（即五斗米道）与黄巾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二六四——二六五页。

降附曹操的青州兵，以地理分布言，汉中、青徐、三辅，都有宗教迷信相号召，在这里也同样存在着公社残余的浓厚气息。某些庸俗史家以为这是宗教的作用，即宗教在农民运动中的作用。其实却适得其反，而是农民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公社残余的回复，是土地兼并集中后农民运动的必然产物。在东方沿海区的青徐与当时所谓近边区的三辅、汉中，社会关系较落后，生产力不大发达，这是燃起农民起义烈火的真正原因，与宗教妖贼（汉灵帝熹平中“妖贼大起”，见《典略》）无关。宗教妖贼不过是开始期的一种假象而已（在《太平经》上面寻找农民运动的理论根据，乃是天大的笑话）。宗教在农民运动中，随着运动的展开，宗教迷信必然褪色。旧史氏所记载的“山贼张满，兵败被执，犹曰讖文误我”，似乎是神秘主义的作用，其实决非如此；因为张满也许有此迷信，追随他的群众，却决不是为了讖文而跟着他跑的。公社残余的回复浓厚化，以及宗教迷信与一切神秘主义，都是可以从它自己产生的基础上求得通解的。

余阙《青阳集》三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

“予家合肥。肥之戍军皆（西）夏人。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葷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有余即以与人。无即取诸人亦不少以属意。百斛之粟，数千百缗之钱，可一语而致也。予初以为此异乡相亲乃尔，及以问夏人，凡国中之俗，莫不皆然。其异姓之人如此，其亲姻可知矣。”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二之五摩尼教世家之儒学高昌侯氏一目中对上述文字按语云：

凡曾读摩尼教经者，即知此等有类于共产之风俗，为摩尼教之风俗。即曾考究南宋时闽浙摩尼教情形者，亦知此为摩尼教风俗。西夏既以回鹘窜入之故，受摩尼教之感化，则原为回鹘地之高昌等处，其受摩尼感化必更强。

按闽浙摩尼教，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四年起居舍人王居正所言两浙州县吃菜事魔之俗。同党则相亲，故相亲而事易济，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此说最通。农民在中世纪宗法式的生产组织下，他们的群众性集结，即他们的联系，只有农村公社残余作历史性的回复，才能打破孤立生活的宗法细胞，但这一点都总是利用（自发性的）宗教运动形式来实现。

如果认为只有摩尼教才有“类于共产之风俗”，因而推论整个西夏风俗，都是受了摩尼教之影响，这实在是倒果为因的误解。马克思在一八五一年年的《国际述评》中所涉及的中国社会主义，事实上是任何带有神秘的秘密会社，都有这种社会主义存在；而这种社会主义（因为是农业社会主义）必然在宗教运动中首先出现。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历史问题。

（编者按：这篇遗稿，大约写于一九六一年下半年。）

关于农民战争研究中的 几个理论问题

田 昌 五

建国以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后，农民战争史是史学界争论最多也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争论涉及到历次农民战争和许多史料的解释，但一些争论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地还在理论问题。这里择要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就正于研究农民战争史的师友和同志。

一、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长期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农民战争是反封建的，另一种认为农民战争是封建性的。还有一种意见折中于前两者之间，认为封建社会上行期的农民战争是封建性的，只是到了下行期才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不过，持这种意见的同志现在已经转到第二种意见方面去了，所以对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实际上只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这个问题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由于分析农民战